



主编 周宪 许钧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与

现代性的危机

[美]卡尔·博格斯 著
李俊 蔡海榕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与

现代性的危机

[美] 卡尔·博格斯 著
李俊 蔡海榕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98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美)博格著;李俊,蔡海榕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

(知识分子译丛)

ISBN 7-214-03093-4

I. 知… II. ①博…②李…③蔡… III. 知识分子—作用—研究—世界
IV. D0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294 号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Copyright © 1993 by Carl Boggs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Made by permission of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he Publisher of the English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1-080 号

- 书 名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
著 者 [美]卡尔·博格著
译 者 李 俊 蔡海榕
责任编辑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93-4/D·489
定 价 16.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图景日趋明晰。“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

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专业社会中职业分工越加细密,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中,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

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 宪 许 钧

2001年6月于古城南京

前 言

在过去的20年里,各派学者对通俗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出空前的关注,这种关注自然促使人们进一步考查知识分子现象。知识分子现象既复杂,又常常非常微妙,在工业发达国家尤为显著。现代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思想上来说,知识、信息和交流都在权力结构、阶级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再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下,总的来说,大学和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知识产业所消耗的资源份额不断增加,“研究和开发”成为高科技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介和文化机制对大众意识的影响也比以往更大。与人们更为熟悉的积累过程相比,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增添了新的内涵。因此,对社会理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把知识分子在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概念化。这种变革在从欧洲到日本、从北美到俄国的辽阔的世界大地上到处可见。

本书考察了知识分子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这些多重而又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变化已持续了至少两个世纪,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为意识形态的霸权而不断斗争的知识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层面。以下几章的论证是围绕着一系列问题来展开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类型有哪些?它们又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知识分子

的政治作用是什么,是霸权的还是反霸权的,是起支配作用还是颠覆作用?这些作用又是怎样随着现代性危机的不断加深而变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力量或大众选民(包括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知识分子是否已成为一个利益和价值观与众不同的社会团体?仅是一个阶层?一个阶级?哪些条件会促使一个有助于创造历史的批判性或对抗的知识阶层的形成?或者这个问题在现代语境下,已不再会引起共鸣了?

X 知识分子参与思想的生产和传播。很显然,这种思想的生产和传播从古希腊至今,一直表现为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当然,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贡献是独创性的,或者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近来,知识分子阶层的概念会使人想起下列各种角色:专业人员、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记者甚至政治家。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具体信念、思想、态度和神话的再生产,或以某种方式逐渐削弱它们的影响。然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已在工作领域、政治、文化和那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体现出来,那些普通人也并非总是知识界或思想界的专家。鉴于这一点,这个概念就不一定局限于纯粹对上述抽象角色的思考上了。知识分子的活动的确是非常分散的,这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尤其如此。关于知识分子范围的这种观点近似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名言,并且显然受到该名言的启发。这句名言是这样的:因为几乎每个人实际上都参与到具体的世界概念之中,所以说到底,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是知识分子和“哲学家”。“每个人都有道德行为意识,因而,大家都会有助于维护该世界概念,或者改变该概念,也就是说,引进新的思维模式。”这意味着“尽管人们可以谈论知识分子,但人们无法谈论非知识分子,因为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与其说人人都是没有差别的知识分子,倒不如

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的分布已相当广泛,以至于旧的区分方法和界限已显得相当模糊。知识和信息已不再被褊狭的贵族精英所独占。这是现代性遗产中更具活力的东西之一。这种活力已反映在脑力劳动诸形式的快速扩展、大众教育的兴起、高技术信息革命的崛起、大众媒介的广泛影响和文化的普遍可接近性之中。

因此,本书所采用的研究知识分子的方法是从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出发的。传统的方法把研究重点放在个人或小群体知识分子(如“纽约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发挥了明显富有创造性的作用,或扮演了通常与“知识分子”概念有关的种种角色(作家、教授、牧师、艺术家)。今天,知识分子话语的特征本身已更为普遍,它与普通的、世俗的和日常社会存在领域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这种话语很少注重它自身的逻辑性,它决不可能真正地自由漂浮于形成所有人类生活方式的大量社会力量之外。同时,由于社会身份总是复杂的,且又总是从一种语境和时刻向另一种语境和时刻转变,所以,知识界不能被简化成单纯、隐晦的范畴,如“小资产阶级”或“专业管理阶级”。在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无论如何定义)和阶级或社会结构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如果身份是以社会为基础的,那么,它们在历史定义的语境中,仍然是根据推论来创造和维持的。并且,身份不仅仅是结构实体(structural entities),而一般是通过社会冲突和集体斗争的中介形成的。所以,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涉及到知识分子和社会生活之间、意识形态和物质条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如果不涉及另一主题,即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的激进政治的命运,就很难分析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话语的转变。虽然

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比以往更为尖锐,但是,左派还是面对着它自己身份和目的的困境,这种困境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随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受挫和资本主义危机给对抗的话语(*oppositional discourse*)和政治创造了新的空间,左派的混乱感和信心的丧失似乎摄服了它自己,它的瘫痪阻碍了反霸权运动的阐述。在60年代激进主义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新社会运动的扩散和苏联模式的解体并没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新的学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和别的)在大学外面并没得到什么响应。列宁主义在工业化国家里没有提供多少改革潜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共产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民主内已发展成了少数派反对党形式。劳工运动不但没有因经济危机而得到加强或激进化,反而在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它们可能永远无法获胜的循环之中。新运动(也不再那么“新”了),尤其是女权主义和生态学,已经对群众意识甚至公众政策都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们的极端片面化,他们在政治上仍有其局限性。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处于新运动能量顶峰的绿党,似乎也失去了他们激进的锋芒——德国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在德国,乌托邦式的希望融入了社会民主的实用主义之中。

人们提供了很多理由来解释这一政治僵局的出现:全球经济的巨大变化,保守选举力量的胜利,作为社会主义神话的官僚中央集权主义留有的遗产,媒体操纵力量,当然还有反映“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的普遍理论和政治信念的衰落。持续不变的现实是,对抗的力量和运动——那些有潜力推翻非理性的、具有破坏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运动——缺乏任何坚实的意识形态支撑。

在这些情况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主要困境是,尽管对激进干预的需求是迫切的,但是,障碍也许比以前的历史时期更大。思维的批判模式是决定性的,因为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有效的社会变革发生。挑战是真正普罗米修斯式的,亦即集体主体性(collective subjectivity)的恢复针对牢固确立的统治形式,这些统治形式要求在扩大了的公共领域内构筑新的社会身份。没有知识分子生活的复活,为获取授予权力而进行的全面斗争注定缺乏方向感与和谐感。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是,阐明历史的意义,揭示阶级和权力关系的实质,并提供一个激进变革的视野。

然而,正如我在下面将坚持主张的那样,如果不探索技术和它的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就无法谈论知识分子话语。作为效率和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潜藏于诸如官僚、专业主义和媒体影响的实践中)以无数种方法加强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整个文化(包括我们的知识分子生活)。技术合理化使公司、国家和军队能殖民公共领域。在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这种进步观与不断增加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的生产有联系。通过支持通过无限工业增长获得幸福的承诺,这一意识形态产生了自19世纪早期以来贯穿工业化世界的广泛的大众舆论。

尽管科学和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蕴藏其中的常见的进步概念结果证明只是幻想而已。权力更加集中于少数统治精英的手中。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假的。现代战争方法已变得更具破坏性,也经常因其技术“效率”和远离作恶者,而被认为是更能接受的。汽车文化破

xiii 坏了社群(community)。计算机增大了政治控制和监督的范围。地球上的土壤、食物、水和空气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污染。遗传工程导致无法预测的并且也许是灾难性的生物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的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来复制自己。

所有这些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含义是双重的和矛盾的:霸权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technocratic intelligentsia)的兴起伴随着其对社会力量的否定,这些社会力量产生于上述条件。现代性危机在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思维模式和批判性思维模式之间、在统治结构和对抗派的萌芽形式之间,产生了划时代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新社会运动出现时就已经可见了。随着危机逐渐增强,霸权的意识形态统治可能更进一步削弱,并因此而加剧了社会分裂,为更可行的对抗性政治铺平道路。公司精英和机构管理者(institutional managers)把持了理性的有序的世界。这一世界的未来的削弱为一种新的时空感留下余地,这种时空感潜在地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复活。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critical public intellectuals)能作为政治角色而全面参与。对现代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整体的挑战肯定将跨越工作场所的界限,进入社群和地方性生活的每个方面。当然,关于这一过程并无任何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东西:对现代性的“后现代”否定能像一致的激进选择一样,轻易地造成混乱和僵化。然而,我的论点却更为乐观。一个真正激进的民主政治要有机会的话,那么,它必须在较大的范围内,经过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活力和大众赋予权力的结合才能到来——这是现代性危机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法”。

我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才开始想写这本书的。当时，我已开始对葛兰西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并对他的知识分子理论很着迷。这种理论对霸权和革命的主题非常重要。已故的艾尔文·古德纳，当时我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提供了最初的冲动——既通过他自己的理论研究，又通过他个人的鼓励。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古德纳在具有开创性的《知识分子的将来》一书中表现出的强烈的乐观主义，但是，这部作品（以及《两种马克思主义》）在从一个我们共同拥有的激进视角来分析知识分子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虽然有近十年的时间我没接受古德纳的建议，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依然很大。这一点在后面将更明显。

写作这本书的实际过程始于 1985 年，当时我为《自由民主知识分子》选集（布拉格，1986）写了一篇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变革的短文。该书编辑阿兰·加农在我集中精力和研究设计方面帮了大忙。1985 年 10 月，他在安大略省渥太华市组织了围绕本书主题的一个生动的会议。在那里，作者们聚在一起分享种种想法和方法——而这也有助于扩大我对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和政治的理解。第四章的一部分是以节选的形式取自我为选集写的论文。xiv

我也感谢默里·波克钦多年来给予我的思想上的支持和私人支持。波克钦毫无疑问是北美最重要的批判思想家之一。他教了我一些意义深远的东西，包括生态学理论的中心地位、社会变革的集体自发行动的必要性和激进观点的力量。

本书的精华大部分归于拉塞尔·雅各比。我曾和他有过许多生动而广泛的谈话，这些谈话似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对美国学术生活的主要趋势着迷。他那深入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局限性的出色的洞察力，反映在他的有争议但又颇具影响力的《最后的

知识分子》一书中，这也已铭刻在我的思维中。

在国立大学的几个同事也在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慷慨的支持和建议，他们是安娜·马里安·芬博格斯、让·乔可、南希·利迪克、李·迈克尔、汤姆·波拉克、弗兰·罗莎蒙德、大卫·斯坦曼，尤其还有达雷尔·哈曼蒙托，他的友谊和观点帮助我度过了写作的高潮和低谷。我还要感谢所有的真正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我还要感谢海尔·萨福，他从伯克利读研究生以来就一直是我的朋友，他对知识分子困境的理解也许比我所知的任何人都要深刻；感谢阿兰·赫斯金，他的工作体现了最好的批判精神；感谢道格·凯尔内，他对手稿提供了大量的、总是深思熟虑的评价；感谢迈克·曼特，他帮助研究给这个工作以热情的支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的克莱·摩根，他经常在每个环节督促我修改手稿。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1992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知识分子、政治和理论	1
第二章 前工业化社会和雅各宾主义的起源	13
知识分子和政治	18
雅各宾主义的种类	21
反雅各宾的反应	34
第三章 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传统	45
马克思主义——一个分化了的遗产	46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式的雅各宾主义	50
自发革命论的批判	57
葛兰西的综合	67
雅各宾主义的胜利	75
第四章 现代性和知识分子的转变	78
分裂和雅各宾主义：意大利个案	80
战后发展：从分裂到融合	85
现代性和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的兴起	99
一种新雅各宾主义？	111

第五章	大学、现代性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传播	121
	专业主义和技术崇拜	125
	学术生活的合理化	136
	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颠覆	148
	理论为何?	161
	结论	178
第六章	现代性的危机:技术专家治国型、批判性和 其他知识分子	180
	分裂的新来源,对抗的新模式	183
	批判性事业——过去和现在	190
	知识分子和新社会运动	203
	知识分子的未来	223
跋	知识分子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受挫	229
注释	237
索引	263

第一章 导论：知识分子、政治和理论

1

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思潮和政治理论思潮都反复涉及一个主题，那就是努力形成知识分子在重建秩序和为变革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作用的概念。从古希腊时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是决定性的，甚至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作为政治参与者，他们能系统地阐述意识形态和话语，促进大规模团体的形成，使大众的信仰体系合法化。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以及列宁，知识分子在建立制定政治生活的规则和标准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以局部斗争、政党、革命和国家的主要推动者的身份，站在重大的政治团体和政治事件的前列。大动荡和变革时期的历史更能反映出存在于政治信仰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一种内在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尽管知识分子所起的政治作用总是间接的和变化的，但却是决定性的。作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源泉，从传统宗教到启蒙运动的理性、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团体都在权力和知识之间、统治和合法性之间、运动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参与者。

围绕知识分子政治作用的经典争论似乎从未停止过，正如近来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考查所提示的那样。¹ 理论家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知识分子下了很多定义：如知识分子是独立的